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转型与创新

李守可¹, 徐 峥², 周 鉴², 赵小青¹, 朱建童¹

(1.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0;

2.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办公室, 江苏 南通 226010)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有着良好的社会动员历史, 有着群众运动式、思想政治式、行政命令式、强化管理式社会动员实践经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党情、国情和世情, 社会发展复杂性日益加剧, 人民群众认知力日益提高, 全面从严治党建任重道远, 负面网络舆情时有发生。党在社会动员上需要进行转型与创新, 应运用利益保障式、多元参与式、依法依规式、网络引导式社会动员, 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动员质量与能力。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 社会动员;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91(2020)3-0027-04

0 引言

社会动员意指“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旧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 由此人们可以获得新的社会化与行为模式”^[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就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群众凝聚能力, 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 采用了不同的动员方式。社会动员是党的发展和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政治传统和执政方式, “可以说,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就是中共进行成功的社会动员的历史”^[2]。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情况下, 社会动员不仅仅是形成社会共识、凝聚民众力量、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方式, 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齐心协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效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推进社会向良性运行的重要方法, 也是对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的考验。

1 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实践经验

1.1 群众运动式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不但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 而且是国家现代化发展中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恰当而合理地运用社会动员, 不但可以将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信仰行为以及行为方式等有效地融合为一体, 进而减少社会发展的离心倾向, 而且“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声势, 使社会成员为接受新的观念、新的知识以及新的行为方式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 促使广大社会成员在兴趣、动机方面实现有益的转移”^[3]。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 就有着丰富的群众运动经验, 践行的也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发展路线, 民主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中国共产党靠着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和建设的能量, 有效地发动群众参与到革命和发展之中, 形成全民参与的轰轰烈烈态势。社会动员成为党革命和执政的重要法宝。据统计, 1950—1976 年, 中国共产党共组织发动了 75 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平均每场 2.89 年,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等诸领域。^[4]

1.2 思想政治式社会动员

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这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广大农民参与革命的进程中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对广大农民和社会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主张等的宣传与教育, 为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人民的认同、拥护、支持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并在此过程中转变了很

收稿日期: 2020-08-10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SJA1236);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基金资助(苏教师[2016]15号); 南通市第五期“226”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基金资助(通委人才[2017]1号)

作者简介: 李守可(1981—), 男, 山东临沂人,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硕士。

多人的观念,使他们深深地认同了党进行革命与执政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式社会动员,将革命的政治文化融入了底层社会心理,形成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理论的认同,并建构起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意识,也建构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的组织形态、动力机制和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在执政环境中得到发扬光大,并在促进社会动员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3 行政命令式社会动员

行政命令式社会动员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物质财富严重匮乏、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其权威控制和配置资源的能力来推进生产力发展,其基本的形态即是党和国家通过建立包含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组织体系,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路线方针政策及生产任务,推动各级行政组织、社会组织和民众响应执行。行政命令式社会动员具有高度的集权化和组织化特点,党的领导覆盖国家与社会,党通过单位制度将权力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外部压力重重、内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高度契合。

1.4 强化管理式社会动员

群众运动、思想政治和行政命令式社会动员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弊端,那就是这种动员方式更多的是靠精神激励和权力制约推动,长期的持续性效果会变弱。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随着党和政府、党与社会权责管理的进一步梳理,“国家领导的政治动员”模式逐步向“国家引导社会自主动员”机制转变,即全面控制型动员转向管理型动员,在有效保障党和政府目标实现的基础上,通过党和政府逐步下放权力,或者将部分权力返还给市场和社会,使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成长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体。

2 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当代情势

2.1 社会发展复杂性日益加剧

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极高的复杂程度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调整的阶段,社会转型正处于深变形态,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方式正在深度调整,增长的速度和方式也在发生变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正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局面,文化领域正面临着正负能量的交互与冲突,深化改革的任务巨大而富有挑战,经济社会转型面临的形势也比较严峻。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错综复杂,全球秩序结构性矛盾加剧、中美贸易战升级等不确定性因素等加大了中国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5]驾驭和掌控这一“系统工程”,需要深邃的战略思维,需要高超的治理技艺,需要深刻理解和分析中国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必须要正视这些复杂性,分析变动因素,提出解决策略,为顺利进行社会动员消除不稳定、不确定和风险要素。

2.2 人民群众认知力日益提高

中国共产党动员的对象和主体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民群众的总体认知力、分析力和参与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每个人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由一定法律所肯定的、具有法定权利义务的个人主体,而这样的个人,对于国家、社会来说,不应该是消极被动的客体,而应该是积极主动的主体”^[6]。同时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撬动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市场化下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各主体在自我发展的进程中提升了对社会发展的辨识度和参与度,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人民群众角色定位和身份认同的自我觉醒,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社会动员中,要正视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现实,正视社会多元主体发育与完善的现实,顺应国家和社会发展已逐渐跳出扁平化框架的形势,更多地赋予民众自治权和参与权,在尊重、引导人民群众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动员。

2.3 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

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合格的社会动员领导力量,首先自身必须要保持足够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凝聚力,党的自身建设必须要足够严格和高度自律。中国共产党必须本着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本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的决心,将党锤炼成坚强

有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党内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仍然存在,这对党的执政和社会动员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仍然要紧绷全面从严治党这根弦,坚持不懈地从严管党治党,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2.4 负面性网络舆情时有发生

互联网新生态的发展日新月异,已渗透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播的方方面面。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舆论一律和宣传结构,自上而下、权威发声的传统新闻传播规律已经演变为人人发声、分散多元的传播模式。尤其是在当前自媒体高度发达、网络舆情时有爆发的情势之下,各类媒介主体为了吸引流量,提高关注度和曝光度,经常对一些舆论事件进行过度报道和发酵,引发了一起又一起关注度极高的新闻事件。而这其中,很多都是带有负面性的,一方面容易引发民众的高度关注和参与,另一方面也会涣散党的社会动员执行力度。中国共产党要高度关注互联网舆情和网络事件,有效引导、正面发声,尽量避免新闻事件的无底线炒作和别有用心之人或组织的介入与反面宣传,确保互联网的安全和网络舆情的正常走向。

3 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转型创新

3.1 利益保障式社会动员

脱离利益满足的社会动员往往不具备持续性。从本质上讲,利益作为一种需求满足物,承担动力受体的角色,但它又是各类社会主体共同追求的目标,在动力主体之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分配和流动。利益将宏观社会运行动力传导到中观、微观动力主体身上。反过来,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劳动、勤勉的工作又促使整个社会计划、目标较为完满的实现,从而使国家整体利益得到保证。社会成员单个动力实际上凝聚成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宏观运行动力。因此,在社会动员时,中国共产党要尽可能地在保障社会成员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动员,而且要能够持续地为社会动员输送利益,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员动力。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现实来看,就是要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7]、“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8]、“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9]等要求,始终不渝地坚持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的初心,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党的执政根基和方向,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结构利益需求,逐步建立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制度体系,从而提升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拥护力。

3.2 多元参与式社会动员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快速化与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的难度也不断加大,因此,党和政府要逐渐摒弃过去以执政和行政主体为唯一动员体的模式,充分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与动员越来越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大前提下,社会权力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活动舞台,民众、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各类主体有了更多的积极性参与公共事务。而且,各类社会主体能够直接接触广大人民群众,对基层情况更了解、更熟悉,能够较准确地把握基层民众的意愿与诉求,在运行过程中也更能够获得民众的信任与认同,能够发挥党和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党和政府要更多地放权于各类主体,逐步形成以党和政府为主体、各类社会组织协作、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新型社会动员体制机制,形成社会动员的合力与洪流。

3.3 依法依规式社会动员

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理的大背景下,党的社会动员既要传承与借鉴原有社会动员中的有效要素与积极因子,强化组织化动员能力,更要遵循一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新时期党的社会动员的法治化,就是要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法的形式展开,在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中推进党和国家各级机构与组织按照法治要求开展工作,坚持法治政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同时,要强化组织群众在法治框架内实现党的目标,推进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法治观念,知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形成法治思维和守法意识,学会在法治框架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党、政府、民众在法治的框架中形成共识,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党进行社会动员的有序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3.4 网络引导式社会动员

互联网的发展对社会动员既提出了挑战,又创造了机遇。互联网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也孕育

产生了党和国家新的治理载体与动员途径。党和政府必须重视网络空间的社会动员,一方面,要正视网络的强大传播速度和传播能力,正面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与主张,强化使用网络语言、网络符号多变性的阐释,让广大网民和人民群众快速而准确地了解、熟悉、参与各类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广大网民的互动与交流,通过各类APP、论坛、官方微信微博等新媒介,及时听取广大网民与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促进党和政府与民众的即时性交流,回应人民群众通过网络所提出的主张。同时,又要旗帜鲜明地批判与处理各类利用网络进行煽风点火、发布虚假信息、无端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网络舆论走向、使用网络暴力、歪曲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等逆动员行为,逐步建立有效的网络舆论预警机制,对社会舆论中的价值形态加以判断,并能够引导社会形成基本的网络评价标准,净化网络空间,使主流、权威的声音占据网络意见高地,有效引导、动员网民自觉养成正确健康的网络行为习惯,从而为党进行网络动员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

4 结束语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肩负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之中,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和能量,凝聚民心民力,最大限度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高质量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考验着党的执行能力和动员能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唯有从历史与现实之中总结经验教训,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才能更好地提升党的动员能力和动员质量。

参考文献:

- [1]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30.
- [2]李德成,郭常顺.近十年社会动员问题研究综述[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46-54.
- [3]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85.
- [4]彭红波.中国转型期的国家动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3.
- [5]人民日报评论部.以系统思维聚合力[N].人民日报,2014-03-13(5).
- [6]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5.
- [7]陈光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N].人民日报,2015-08-26(7).
- [8]习近平.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应对世界经济挑战[N].人民日报,2015-11-19(2).
- [9]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责任编辑 范可旭)

Social Mob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New Era

LI Shou-ke¹, XU Zheng², ZHOU Jian², ZHAO Xiao-qing¹, ZHU Jian-tong¹

(1.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26010, China;

2. Party Committee Office, Jiangsu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26010,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 glorious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ha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social mobilization of mass movement, ideology and politics, administrative command, and strengthened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faced with more complicated party, nation and world conditions.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increasing; people's awareness is raising; the party's strict governance shoulders heavy responsibilities; and negative online public opinions often occur. The party needs to transform and innovate in social mobilization, which shoul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the party's social mobilization by applying interests' protection, multiple participation, legal compliance, and Internet-guided social mobilization.

Key words: new er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cial mobiliz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